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田野报告丛书

云南第一村

——红塔区大营街的人类学考察

马翀炜 孙信茹等 著

yunnandiyicun

民族出版社

yunnandiyicun

云南第一村

——红塔区大营街的人类学考察

马翀炜 孙信茹等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第一村：红塔区大营街的人类学考察 / 马骞炜，孙信茹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6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田野报告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10112 - 2

I. 云… II. ①马…②孙… III. 乡村—文化人类学—科学考察—考察报告—玉溪市 IV. K927. 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1343 号

云南第一村——红塔区大营街的人类学考察

策划编辑：欧光明

责任编辑：杨蜀艳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http://www.mzcbs.com>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468 千字

印 张：17.625

印 数：0001—1500 册

定 价：5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112 - 2/K · 1747 (汉 92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内容摘要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村因其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获得“云南第一村”美誉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营街只是成千上万中国普通村庄中的一个。近三十年来，高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及集体化的道路使大营街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村庄。

本书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医疗卫生、信息传播与传媒发展、民间习俗、民间艺术、宗教等方面描绘了大营街发展的基本状况，并对大营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思考。

前 言

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准备在昆明举行，大会有一项学术活动就是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点考察。云南大学在2000年完成了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2003年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工作之后，紧接着从2003年底又开始了“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及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的工作。这项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云南省十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长期跟踪式的学术研究。到目前为止，这十个研究基地都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基地建设也比较成熟。显然，此次人类学/民族学大会选择的四个考察点理应出自这十个基地，但由于除了石林县诺黑村、弥勒县可邑村、通海县纳家营村三个学术研究基地离昆明较近，便于学者们进行学术考察之外，绝大多数学术研究基地都远离昆明，往返所需时间太长。于是，大会筹委会决定在这三个学术研究基地之外，新增加一个离昆明不远，有一定代表性的村庄作为考察点。而云南大学原有的研究基地中没有汉族社区的研究基地，故而筹委会倾向于选择一个汉族社区。有关部门经过认真地讨论之后，决定把这个考察点设在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镇的大营街居委会。选择大营街作为学术考察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营街有“云南第一村”的美誉。通过大营街可以展示中国农村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成就。当这个工作正式开始的时候，离大会预定召开的时间仅仅只有半年的时间了。这次调查工作正应了那句大俗

话——“时间紧，任务重”。调查组的组建、调查、写作等一系列工作必须在五个月之内完成。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些文字都是在高度紧张中完成的。

“云南第一村”是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镇大营街居委会^①获得的众多荣誉中最为醒目的一个。“云南第一村”，仅仅是这个名称就足以引人注目，拥有这份很高荣誉的大营街也理应成为将发展问题作为研究重心的乡村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营街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滇中村庄——准确地说，那时的大营街在周边地区还是有些“名气”的，是一个“吃粮难、喝水难、住房难、行路难、娶媳妇难”的“五难村”。1978年，大营街的农村经济总收入仅有9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167元，吃粮还得靠国家返销；到1992年，大营街的农村经济总收入超过亿元，达到10 997.86万元（不含税）；之后又经过3年的高速发展，到1995年，全村农村经济总收入一举超越10亿元大关，达到106 418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6000元。大营街实现了巨变，成为云南省首次突破10亿元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村（居）民委员会，被云南省乡镇企业局命名为乡镇企业“云南第一村”。^②2007年，大营街居委会农村经济总收入41.8亿元，创利润2.37亿元，上缴国家税金1.09亿

^① 大营街居委会在不同的时期又叫大营街办事处、大营街大队、大营街乡等等，为方便行文，下文中的“大营街”即指大营街居委会及其前身。

^② 参见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改革开放启示录》，319～324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2 202 元。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内，大营街实现了高速发展，终结了小农经济的过密化发展模式，通过集体所有的乡镇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农业的反过密化，完成了农村工业化的起步和腾飞。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大营街做到了小有所教、壮有所为、老有所养，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理想。

大营街正是以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而受人关注的，人们往往谈论得更多的是大营街经济增长的“神话”。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由各种深深嵌入社会之中的体系所构成的”^①，经济总是沉浸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的，并且明确经济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的概念，那么我们的研究就必须关注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而又由于“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发展的最本质内容”，^② 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会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这一问题上。

二

玉溪市红塔区地处滇中腹地。地理坐标为东经 102°17′ ~ 102°41′、北纬 24°08′ ~ 24°32′。东连江川县，东南邻通海县，西南依峨山县，北接晋宁县。全区总面积 1004 平方千米。其中山区占总面积的 85%，坝区占 15%。城区（海拔 1630 米）距省会昆明 88 千米。总人口 40 万人（2004 年）。红塔区北宽南窄，四

① [美] 迈克尔·赫兹菲尔德著，刘昕等译：《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140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②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4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面环山，最高海拔 2614 米，最低海拔 1502 米。属珠江水系，南盘江流域。玉溪大河为主干流，支干流 9 条，全长 350 千米，河网密度为 0.35。全区属中亚热带半湿润冷冬高原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6.5℃，极端最高气温 30.8℃，极端最低气温 0.3℃。全年日照 2267 小时，日照率 51%；年均降雨量 957.1 毫米。

红塔区区域在先秦时属古滇国地，在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置益州郡俞元县，境内属俞元县地。蜀汉时在建宁郡俞元县地。两晋时为晋宁郡俞元县地，梁时其地为段氏所有，属西爨地。唐贞观年间，置求州，红塔区域即为所属。玄宗时，云南为南诏控制。肃宗上元元年（760 年），南诏以澄江为河阳郡，郡下辖温富州。温富州的设置，使玉溪市红塔区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成为州一级的行政单位；宋代大理国时为休制部。蒙古军队进入云南后，最初在全省实行军事管制性质的行政机构。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 年）立云南行中书省，置澄江路，下设新兴州。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改澄江路为澄江府。清代沿袭明代设置。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废除府州制，改新兴州为新兴县，隶属于滇中道管辖。民国二年（1913 年），因与广东肇庆新兴县同名，改称休纳县。民国五年（1916 年）因玉溪大河“形似玉带，溪水清澈如碧玉”而改名“玉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50 年 1 月 1 日，云南省滇中专员公署和玉溪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专署、县府驻玉溪州城。1958 年 10 月，江川、玉溪两县合并，称玉溪县，至 1961 年 10 月，又分设二县。1983 年 9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1997 年 12 月 13 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玉溪地区和县级玉溪市，设立地级玉溪市；玉溪市设立红塔区，以原玉溪市的行政区域为红塔区的行政区域。1998 年 3 月 15 日，原县级玉溪市随玉溪地区改为地级玉溪市而改为红塔区。到 2005 年，红塔区设玉兴路、玉带路、凤凰路 3 个街道办事处和北城、大营街、研和、李棋、春和、高仓 6

个镇及小石桥、洛河 2 个乡；81 个村（居）民委员会，其中：17 个居民委员会（含 15 个中心城区社区居民委员会），64 个村民委员会，878 个村（居）民小组，其中：248 个居民小组，630 个村民小组，442 个自然村。

大营街镇位于玉溪市红塔区西南部，东经 $102^{\circ}23'$ ~ $102^{\circ}30'$ ，北纬 $24^{\circ}13'$ ~ $24^{\circ}25'$ 之间。镇政府距州城 5 公里，东接高仓镇，西与洛河乡接壤，南邻研和镇，北与春和镇连接。大营街，元至元十三年（1256 年）属新兴州管辖；明代，屯田制属云南左卫管辖，为屯垦中心大营。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州设九乡，属左德乡管辖；清咸丰、同治年间四方农民于此集中贸易，成为集市，故名大营街。民国十九年（1930 年）左德乡隶属玉溪县第三区；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分为左德乡与大营街镇；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左德乡与大营街镇合并为汇溪镇。

1949 年 12 月汇溪镇与石庵乡合并，成立玉溪县石汇区人民政府。1950 年元旦县人民政府成立，元月 3 日由石汇区划出新凤区，2 月石汇区分设为石庵区及汇溪区，6 月新凤区又并入汇溪区，8 月改称第四区人民政府。1958 年 4 月撤区并乡，全县设 20 个大乡、镇，第四区分为大营街、赵桅、洛河 3 个大乡；同年 10 月，3 个大乡合并为跃进人民公社；同年 12 月改称杯湖人民公社。1963 年 1 月恢复区建制，杯湖、洛河两公社合并为第四区。1966 年 7 月第四区划分为大营街、洛河两个公社，大营街公社辖 10 个生产大队：大营街、郭井、赤马、大密锣、龙潭、杯湖、常理、师棋、赵桅、甸苴。1983 年 9 月撤县建市，1984 年 1 月，撤大营街公社，建大营街区公所，改大营街大队为大营街镇，其余生产大队改为乡。1988 年 1 月撤区建乡、镇区划。撤大营街区公所，建立大营街镇人民政府，辖 10 个办事处。大营街办事处辖 4 个自然村——大营街、唐棋、河坝、下西古城，9 个农业社。1999 年，大营街办事处改为居民委员会。



三

本书从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医疗卫生、信息转播与传媒发展、民间习俗、民间艺术、宗教等几个方面来描绘大营街的基本状况，在结语部分对大营街的社会发展提出一些思考。

第一章“人口”，介绍大营街人口以及婚姻家庭等基本情况。2007年，大营街居委会会有1782户人家，共5339人，其中98.82%的居民为汉族。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营街陆续出现了一批有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企业。伴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大营街居民中以务农为生的居民比率逐年下降，近几年来，绝大多数居民都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工作。

第二章“经济”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之一。首先介绍1949年以前大营街的经济的发展情况，接着介绍1949年以后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集体企业发展的历程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情况。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营街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还是“人地矛盾”。1949年以前，这一矛盾就已经十分明显了。从我们可以调查到的较为准确的资料来看，大营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人口约2900人左右，水田1887亩，地187亩。人均拥有水田约0.65亩，拥有地约0.06亩。1980年，有人口3779人，水田1810亩，地258亩。人均拥有水田约0.48亩，拥有地0.07亩。1990年，4290人，水田1613亩，地266亩，人均拥有水田0.38亩，拥有地0.06亩。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大营街的人口数在不断增长，人均占有的农田面积在不断缩减。从我们统计的任何一年的数据来看，如果单纯从事农业生产，至多就是解决“吃饭难”的问题，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集体企业的成长在大营街的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玉溪地区乡村集体企业的最初成立是在 1958 年，共有 6 家，但增长速度很慢。1964 年大营街生产大队基建队成立。这个基建队主要是以单包（工时造价）形式在玉溪县境内承担土建工程。成立之初，大营街基建队共有 30 人左右，职工全系大营街生产大队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建队为大营街的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领导大营街实现社会转轨、经济起飞的骨干力量差不多都来自于这个基建队。1980 年 8 月大营街投资兴建了“大营街红砖厂”，1981 年 1 月 5 日正式投产。1983 年大营街集体投资建成了食品加工企业“玉溪市芝麻片厂”。这些企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现在还保存着一口旧砖窑，作为当年艰苦创业的象征。^①至少也表明华西村在发展之初也紧紧依附于土地资源。

随着基建队、红砖厂和芝麻片厂等企业的发展，大营街人掘得了后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到 1983 年，大营街工农业总产值为 252.3337 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139.7995 万元，占总产值的 55.4%。到 1986 年时，大营街工农业总产值为 433.0478 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335.3678 万元，占总产值的 77.44%。从全国来讲，到 1992 年，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到 2002 年，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半壁江山。而大营街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就早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到 2006 年，由于建工厂、修公园，开发房地产等原因，大营街的耕地面积只有 513 亩了，人均耕地只有微不足道的 0.1 亩了。大营街居民的土地在不断地减少，但他们的收入却不断增加。这一年大营街的经济总收入达到了 23.21

^① 参见彭玉生：《城市向农村工业辐射了什么？》，见〔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四辑），323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亿元，创利税 1.27 亿元，农民人均收入 11 200 元。无论从哪方面讲，大营街的发展速度都是令人惊讶的。大营街的集体乡镇企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大营街真正意义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间是比较短的。1983 年 6 月，经过充分讨论，大营街大队 9 个生产队全部实行大包干生产，社员承包土地到户，基本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在全国很多农村开始瓜分集体企业的时候，大营街的集体企业没有被分掉。而正是这些集体企业为大营街后来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 1983 年开始，到 1984 年结束，大营街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到 1986 年，各家各户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1986 年后大营街开始逐步把土地重新收回集体使用。

1986 年，大营街首先收归集体统一管理的是山地。这是因为大营街的山地总面积很少，村民人均面积不足 0.09 亩，山地种植作物收入对家庭经济收入没有多少贡献；而随着大营街集体企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厂房建设用地，较之于耕田，山地更容易成为开发的首选对象。1994 年，大营街开始把 1984 年已经承包到各家各户的耕田收归集体，再按人头重新分配，由集体统一管理。由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期的集体企业发展高潮中，厂房建设用地占用了第二、第三和第八村民小组的田，尽管在占用土地的时候大营街办事处给予了适当的补偿，但在客观上却导致了部分村民的耕田面积急剧减少，直接影响到了村民的口粮问题；并且由于占用的耕田比较多，从 1989 年到 1994 年，5 年的时间，因为发展集体企业需要厂房建设用地就占用了 97 亩耕田，占到了 1994 年耕田总面积的 6.3%，因此补偿调整起来比较麻烦。于是由办事处出面，把全办事处的耕田全部重新收归集体，然后不分男女老少，按人头平均分配耕田，每人 0.42

亩耕田。从1995年后，凡集体占用到村民耕田的，就一律补偿费用，不再重新调整耕田。补偿标准是大小春每亩1000元，一直补偿到2000年集体发口粮米为止。而没有被占用的耕田，依然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各家各户负责农忙时节的播种、收割，日常田间管理则交给居民委员会的6个专职农业管理人员管理。2000年，大营街把所有的耕田收归集体（尽管从名义上讲每个大营街人都有几分田地），并逐步改变了耕田的用途，通过改变土地用途，使土地大幅度增值，从而彻底结束了大营街农田种植水稻的历史。由于土地由居委会以集体的名义来统一配置，就使得作为集体所有的集体企业在投产建厂的时候省掉了土地征拨和使用的大笔费用。这对于发展之初资金极其匮乏的乡镇企业而言，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即使在今天土地使用的廉价也还是保证这些企业能迅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乡村工业的发展，大营街基本建立了强大的集体经济规模。1998年之后，尽管集体性质的工业企业的收入占整个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率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集体经济还是大营街经济的重要构成。

同样，随着大营街集体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大营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映月潭修闲文化中心、汇龙生态观光园、玉溪汇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的相继成立，也使得集体企业的经营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

第三章“政治社会”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作为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大营街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转型突出表现在社会结构和社区居民群体构成上的变化。本章主要从大营街居民阶层结构的演变、社会分层的现状；政治组织结构的演变及现状；社会组织的现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地梳理和分析。其中，重点分析了大营街社会分层的现状，对农业劳动者、集体企业职工、社区管理者、企业



管理者、无劳动能力者、外来者等群体的构成及其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社区管理者和企业管理者往往是合二为一，既充当着社区的政治精英，也充当着社区的经济精英乃至文化精英。

第四章“教育”部分，首先回顾了1949年以前大营街教育的基本情况，然后从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教育发展事业不仅包括了学校的幼儿教育、小学义务教育，也包括了企业的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还包括了狭义层面上的社会教育如老年学校、人口计划生育学校等方面。立体化的教育培训体系，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通过立体化的教育体系建构了要学习、能学习的社会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抚平了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造成的剧烈冲击，为大营街从一个具有浓郁文化传统的经济欠发达的乡村转变为具有现代市场气息的经济高度发达的小城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在企业教育上，云南玉溪水松纸厂、玉溪市汇溪公园、汇龙生态观光园等企业通过督促职工每天完成工作日记、举办职工文化夜校、操作技术技能培训、职工技能知识竞赛、文娱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提高了企业职工的职业技能，而且提高了职工的综合素质，完成了员工从农民转变为现代企业职工的历史性转型。

第五章“医疗卫生”卫生部分，主要梳理了大营街医疗卫生事业的历史发展及其现实状况。1949年以前的大营街没有正规的医疗机构；大营街的医疗卫生事业在1949年以后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经营等几个发展时期。从中可以看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对于今天的大营街来说，当地医疗体系实行的是由政府进行组织和引导，吸引农民自愿参加，采取个人、集体、政府多方筹措积累资金，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

制度。



剧的起源、演变和现状。第五节“传统手工艺和现代木雕艺术”部分，简要介绍了大营街历史上的杰出手工艺匠人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另外，特别介绍了现在大营街的民间木雕艺术家陈宝贵的个人经历和创作历程。第六节“建筑艺术”部分，主要介绍了大营街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公共建筑和民居，与之做对比，还展示了大营街的现代公共建筑、居民建筑以及大型雕塑作品。

第九章“宗教”部分主要研究大营街民众的宗教生活。作为一个汉族聚居的社区，大营街存在以佛教、道教为主的“制度性宗教”和以民间日常性祭祀活动为主的“非制度性宗教”。大营街民众的宗教生活并非只在寺院中进行，对于大营街的百姓而言，更为广泛的宗教祭祀活动往往是和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内容连接在一起的。本章对大营街的佛教、道教信仰及其活动进行了介绍，并描绘了各类民间宗教祭祀及仪式活动。同时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转型下宗教文化的变迁也作了一定分析，认为实用性和功利性成为当地宗教文化的突出特点。对于大营街来说，宗教实用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宗教和当地文化的积极融合上。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和传统地方民间文化的融合，二是和本地企业文化的融合。

第十章为“权充结语”部分。通过对大营街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思索，提出这样的看法：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农村可能的发展道路之多是无法一言以蔽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抑或其他什么模式都有可能在一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巨大的进步。大营街能否称为模式也并不重要。这些林林总总的成功发展经验是值得人们总结的，尤为关键的，可能是人们应当从中看到“启示”而不是得到“模式”。这些地方的发展经验绝无简单地被其他地方所复制的可能，甚至就是这些地方在现时及未来的发展中一定还有许多的困境要去面对，有许多的问题要去解决。大营街当然也是这样。

四